

# 战略收缩、同盟牵连与美国政策困境<sup>\*</sup>

曹 玮 张瀚暘

**【内容提要】** 在明确认定中国是其首要战略对手,且为应对“中国挑战”将战略资源向“印太”地区集中的情况下,美国对俄政策的理性选择应当是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分化中俄乃至联俄制华。但美国的实际选择却与这种理性选择的预期相反,2022年美国积极介入俄乌冲突和支持乌克兰进一步加剧了美俄对抗态势。本文研究了美国对俄政策偏离理性最优选项的原因。美国要想更有力地遏制中国就必须进行战略收缩以集中资源,而进行战略收缩就必须更多依赖盟友的力量,必须对盟友提供更可信的同盟承诺以回应盟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正是美国欧洲盟友的主要安全威胁。美国要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就必须站在盟友一边与俄罗斯为敌;而要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则将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友的信任。这种矛盾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对俄政策的选择空间。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有可能在客观上起到缓解而非加剧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作用。

**【关键词】** 美俄关系 牵连风险 同盟困境 战略收缩 中美俄战略三角

**【作者简介】** 曹玮,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电子邮箱:cwangel@163.com

张瀚暘,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380383130@qq.com

自奥巴马政府后期以来,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中国是美国必须全力应对的最大战略挑战这一点上逐渐形成共识。特朗普政府时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是美国最大

---

<sup>\*</sup> 本文是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高精尖学科建设科研专项资金课题“中美安全竞争中的第三方因素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GA01)的阶段性成果。

竞争对手,必须采取积极强硬手段应对中国挑战”<sup>①</sup>。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强调,“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竞争对手”<sup>②</sup>。与这种战略方针相一致,近年来美国在全球层面实行战略收缩的速度明显加快。

在美国已经明确认定中国是其首要战略对手,且已在进行战略收缩的情况下<sup>③</sup>,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相对更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做法显然是利

---

①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December 18, 2017, <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17.pdf?ver=CnFwURrw09pJ0q5EogFpwg%3d%3d>,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日;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19, 2018, [https://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20/04/2018\\_NDS.pdf](https://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20/04/2018_NDS.pdf),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日。

②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October 12, 2022, p. 2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日。

③ 自奥巴马政府至今,美国在事实上采取了战略收缩政策,且战略收缩趋势不断凸显是当前美国研究界的主流共识。参见: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Graceful Decline? 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p. 7-44;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he Wisdom of Retrenchment: America Must Cut Back to Move Forward,”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6, 2011, pp. 32-47; Charles A. Kupchan, “Exiting Afghanistan Will Improve America’s Global Standing in the Long Ru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ugust 30, 2021, <https://www.cfr.org/article/exiting-afghanistan-will-improve-americas-global-standing-long-run>,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日; Hal Brands and Michael Beckley, “China Is a Declining Power—and That’s the Problem,” September 24,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9/24/china-great-power-united-states/>,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日; Minxin Pei, “The Security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Focus on China,” January 11, 2022,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the-security-consequences-of-americas-focus-on-china/>,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日; Robert D. Blackwill and Richard H. Fontaine Jr., “Ukraine War Should Slow But Not Stop the U. S. Pivot to Asia,” March 14, 2022, <https://www.cfr.org/article/ukraine-war-should-slow-not-stop-us-pivot-asia>,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日; 达巍:《全球再平衡: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再思考》,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55—77页;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4—28页;节大磊:《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第50—69页;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2期,第1—34页;刘博文:《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1期,第88—124页;孙兴杰:《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69—85页;肖河:《优势认知下的遏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性质和结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8期,第4—30页。

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反华遏华国际统一战线”。但美国的实际做法却与这种理性选择预期存在明显偏差,这种偏差集中体现在近年来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上。从地缘政治和外交博弈的角度看,美国能否成功遏压中国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能否分化中俄、全面孤立中国。反过来,对美国来说的最坏结果,则是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同时为敌。但是,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却仍然同时将中国和俄罗斯界定为美国的竞争对手<sup>①</sup>,非但没有在中俄之间打楔子,反而将自己打造为中俄的共同威胁。乌克兰危机自2021年末不断升级,直至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美国不断将战略资源投入到东欧,由此形成了在东亚纠集盟国和战略伙伴联合遏压中国,同时在东欧与盟国联合对抗俄罗斯的地缘战略态势。

这种“两线作战”局面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不利甚至十分危险的。<sup>②</sup>首先,加剧与俄罗斯对抗的策略与美国加速战略收缩、集中资源遏制中国的战略方针抵触。同时,这种做法必然会进一步巩固中俄战略合作的基础。2022年2月,中俄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支持对方核心利益关切。<sup>③</sup>随后在9月上合组织峰会期间的会晤中,两国领导人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sup>④</sup>

其次,“两线作战”还导致美国面临在欧洲和东亚与两个核大国同时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正是因为预见到这些弊端和风险,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早在2014年就建议美国放弃乌克兰,修复与

<sup>①</sup>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p. 8;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 2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其中,拜登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将优先考虑保持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同时约束仍然十分危险的俄罗斯”。

<sup>②</sup> “两线作战”不必然意味着失败,但政治军事历史和理论的基本常识是,“两线作战”的失败概率高于集中优势兵力和资源各个击破的失败概率。

<sup>③</sup> 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2022年2月4日,来源:[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202/t20220204\\_10638954.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202/t20220204_10638954.s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

<sup>④</sup> 新华社:《习近平主席的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时间》,2022年9月17日,来源:[http://www.news.cn/2022-09/17/c\\_1129009786.htm](http://www.news.cn/2022-09/17/c_1129009786.htm), 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

俄罗斯的关系，“因为美国需要莫斯科的帮助来……对抗美国唯一真正的潜在对手中国”<sup>①</sup>。2017年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表示，美国必须警惕中俄可能形成战略联盟的巨大危险，调整对俄遏制政策。<sup>②</sup>基于同样的关切，2020年美国100多位前政要和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联合发表公开信，呼吁当时的特朗普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改善美俄关系。<sup>③</sup>

再次，正是因为意识到俄罗斯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以及同时与中俄为敌的危险性，美国决策者曾经尝试调整对俄政策。例如，2009年奥巴马政府就试图重置(reset)美俄关系。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寻求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建立稳定、实质性、多层面的关系，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尊重国际准则的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利益”<sup>④</sup>。同年北约“战略概念”报告也表示将“寻求与俄罗斯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北约也不是俄罗斯的威胁”<sup>⑤</sup>。2014年奥巴马公开表示，俄罗斯是“地区强国”而“非美国头号地缘政治敌人”。<sup>⑥</sup>

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美国业已锁定中国是其首要竞争对手并且美国政治精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改善美俄关系对美国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情

---

① John J. Mearsheimer, “Getting Ukraine Wrong,” *New York Times*, March 14, 2014, <https://www.nytimes.com/2014/03/14/opinion/getting-ukraine-wrong.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

② Zbigniew Brzezinski, “How to Address Strategic Insecurity in a Turbulent Age,”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 34, No. 2, 2017, pp. 29-35.

③ Rose Gottemoeller et al., “It’s Time to Rethink Our Russia Policy,” August 5, 2020, <https://www.russiamatters.org/analysis/its-time-rethink-our-russia-policy>, 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 44, [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10.pdf?ver=Zt7IeSPX2uNQ00\\_7wq6Hg%3d%3d](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10.pdf?ver=Zt7IeSPX2uNQ00_7wq6Hg%3d%3d), 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

⑤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ctive Engagement, Modern Defense,” November 19, 2010, pp. 3-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68580.htm](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68580.htm), 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

⑥ “Russia Is ‘A Regional Power’, Not Top Geopolitical Foe,” NBC News, March 25, 2014, <https://www.nbcnews.com/storyline/ukraine-crisis/obama-russia-regional-power-not-top-geopolitical-foe-n61601>, 访问时间:2023年1月3日。

抗性对俄政策?

本文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美国的同盟承诺与美国的战略收缩意图之间存在深刻矛盾,这极大地降低了美国选择改善美俄关系的可能性。从一般意义上对这个问题的展开回答是:当大国实力相对衰落并因此采取战略收缩策略时,为防止失去对盟国的领导力,大国须对盟国做出更可信的承诺和采取更积极的履约行为,而这样做会增加大国被盟国牵连的风险。一方面,更积极地履行同盟承诺本身就与大国战略资源从全球收缩的战略意图存在张力;另一方面,如果盟国受到某个同盟外国家的威胁或卷入与后者的冲突,因战略收缩而增加的对盟国的安全承诺将迫使大国选择保持甚至强化与该同盟外大国的敌对关系。对当前的美国来说,要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就必须与俄罗斯为敌;要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和分化中俄关系,则将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友的信任。这种两难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的对俄政策选择。

以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关于美国难以从根本上调整对俄政策的现有解释并指出其不足。第二部分从美国战略收缩的政策选择入手,分析战略收缩背景下的同盟牵连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国战略收缩悖论,从理论上揭示美国对俄政策困境。第三部分以2014年以来两次乌克兰危机为案例,展示美国因盟友牵连而不得不加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介入力度,并由此导致美俄关系不断恶化、美国战略资源不断分散消耗的实际过程。最后是结论。

## 一、美国对俄政策的现有解释及其不足

### (一) 美国难以调整对俄政策的现有解释

随着2009年“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更加积极主动地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sup>①</sup>在通过采取诸如暂缓推动格鲁吉亚等国加入北约等一系列措施,弱化了俄罗斯有关其战略空间被挤压的担忧之后,美国在削减

---

<sup>①</sup> 张建、周琪:《奥巴马第二任期美俄关系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86—105页。

进攻性战略武器、阿富汗问题、伊核问题等议题上与俄罗斯取得重大突破和谅解。但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开始执行对俄敌视政策,奥巴马甚至在即将卸任时紧急追加对俄制裁,以为特朗普上任后改善对俄关系设置门槛。<sup>①</sup>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虽欲重启美俄关系,却重启失败,基本延续了奥巴马执政后期对俄强硬政策。现任拜登政府则是基本延续了以制裁为主要内容的对俄政策,将中国和俄罗斯同时界定为美国的竞争对手。<sup>②</sup> 可见,尽管奥巴马任期前半段为美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且特朗普有志于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但从奥巴马政府后期以来,美国在实际的政策层面却执行了对俄强硬路线。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了美对俄政策的改变?学界对此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有关。相当多的研究认为,美国的国内政治结构、精英群体、社会舆论对总统的对俄政策偏好进行有效的制约和平衡。例如,特朗普早在总统大选期间就表现出改善对俄政策的意愿。他在党内初选时就明确表示,“如果我们能与俄罗斯有良好关系,这将是非常棒的”<sup>③</sup>。2017年1月,白宫针对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与普京的通话发表声明,表示这次通话“是改善需要修复的美俄关系的一个重要开端”<sup>④</sup>。尽管如此,特朗普最终却并未成功重启美俄关系,其原因就在于特朗普的对俄政策受到美国国会、舆论界以及精英群体的极大牵制,而美国极右翼保守派的规模和影响力相对有限。<sup>⑤</sup> 相关研究认为,特朗普控制不了共和党、议会、法院和

---

① 《奥巴马卸任前强硬制裁俄 德媒:借此施压特朗普》,载《参考消息》,2016年12月31日,<http://m.cankaoxiaoxi.com/liebao/world/20161231/1569644.shtml?s=cm>,访问时间:2023年1月5日。

②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p. 8.

③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China ‘Would Be Great’ for US-Trump,” January 26, 2016, <https://sputniknews.com/20160126/us-russia-china-trump-1033740935.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月5日。

④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the President’s Call with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January 28,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7/01/28/readout-presidents-call-russian-president-vladimir-putin>, 访问时间:2023年1月5日。

⑤ 黄登学:《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6期,第84—85页;付随鑫:《美国极右翼保守派的亲俄倾向及其影响》,载《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3期,第106—125页。

新闻媒体,美国国内也缺乏对美俄关系大幅改善的政治和民意基础。<sup>①</sup> 美国还有大量来自前苏联国家的反俄游说团体,他们也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议程,并在美国国内营造某种共识:与俄罗斯妥协,或者对俄罗斯的动机与利益持客观的、理解的态度,都是没有建设性意义的。<sup>②</sup>

在这些行为体中,以国会、军队鹰派和情报部门为首的国内反俄政治势力对总统有强有力的束缚和规制<sup>③</sup>,其中尤以国会对总统的对俄政策施加了最为强大和彻底的限制。典型例子是2017年美国国会通过《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该法案规定,只有经过国会批准,才能解除与乌克兰有关的对俄制裁,从而将对俄制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防止总统对俄罗斯可能做出的妥协。<sup>④</sup>

第二种解释与美国的国内意识形态有关。因与美国所主张的“民主”不同,俄罗斯被美国外交政策文件描述为在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悖”的世界里“寻求恢复其大国地位”的侵略者。<sup>⑤</sup> 有研究认为,当今改善对俄关系的最大阻力就是普京对俄罗斯实施的“专制”制度,美国需要促进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同一个“民主”的俄罗斯打交道。<sup>⑥</sup> 基于“俄罗斯国内专制威权,违反人权,破坏民主法制”,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美国建制派强烈坚持对俄罗斯实施对抗、威慑和遏制政策。<sup>⑦</sup> 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主导美国

① 韩克敌:《特朗普的对俄政策与美俄关系的四个维度》,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4期,第62—63页。

② A·克里科维奇、Y·韦伯:《美国行为的根源——以美国对俄政策为例》,郇洁译,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32—46页。

③ 李秀蛟:《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载《美国研究》,2021年第3期,第149页。

④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 August 2, 2017, <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financial-sanctions/sanctions-programs-and-country-information/countering-americas-adversaries-through-sanctions-act-related-sanctions>, 访问时间:2023年1月5日。

⑤ Martin Russell, “US-Russia Relations: Reaching the Point of No Return?” European Parliamentary, October 2018, p. 7,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28230/EPRS\\_BRI\(2018\)628230\\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28230/EPRS_BRI(2018)628230_EN.pdf), 访问时间:2023年1月5日。

⑥ Mark N. Katz, “Can Russian-US Relations Improve?”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8, No. 2, 2014, pp. 129-141.

⑦ 李秀蛟:《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第126页。

对俄关系的状况下,美俄关系难以短时期内实质改善。<sup>①</sup> 美国的外交界甚至达成某种共识,只要普京仍然担任俄罗斯总统,美俄关系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sup>②</sup>

第三种解释是受地区安全问题的影响。在美俄关系中,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无法回避,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使得美国的对俄认知在总体上趋于恶化,几乎处于一个不可逆的态势。<sup>③</sup> 在叙利亚问题上,美俄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重大政治分歧,这限制了美俄关系重启的“量”与“度”。<sup>④</sup>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将美俄关系推向“新冷战”边缘,带入“新对峙”阶段<sup>⑤</sup>,双边关系降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sup>⑥</sup>。这不仅宣告了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对俄重启政策失败,也标志着西方首次限制而不是支持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融入全球经济。<sup>⑦</sup> 研究认为,美俄关系由21世纪初的“有

① 冯绍雷:《美国对俄罗斯问题的决策争议和认知差异》,载《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3—31页。

② Dmitry Suslov, “US-Russia Confrontation and a New Global Balance,” *Strategic Analysis*, Vol. 40, No. 6, 2016, pp. 547-560.

③ 冯绍雷:《美国对俄罗斯问题的决策争议和认知差异》,第6页。

④ 黄登学:《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第88页。

⑤ Ari Heistein, “More Coherence, Greater Tension: Prospects for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under Biden,”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sight No. 1439, February 14, 2021; 李秀蛟:《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第117页;樊吉社:《冷战博弈能否终结:美俄关系的发展与变数》,载《人民论坛》,2017年第6期,第45页;张建、周琪:《奥巴马第二任期美俄关系论析》,第86—105页。

⑥ Eugene Rumer et al., “Illusions VS Reality: Twenty-Five Years of U. S. Policy Toward Russia, Ukraine, and Eura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February 23, 2017,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2/09/illusions-vs-reality-twenty-five-years-of-u.-s.-policy-toward-russia-ukraine-and-eurasia-pub-67859>, 访问时间:2023年1月5日; Eugene Rumer and Richard Sokolsky, “Thirty Years of U. S. Policy Toward Russia: Can the Vicious Circle Be Broke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20, 2019,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06/20/thirty-years-of-u.-s.-policy-toward-russia-can-vicious-circle-be-broken-pub-79323>, 访问时间:2023年1月5日; 陶文钊:《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载《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4期,第9页;黄登学:《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第67—91页。

⑦ Nigel Gould-Davies, “Russia, the West and Sanctions,” *Survival*, Vol. 62, No. 1, 2020, p. 7.

限伙伴”退化为“有限对手”。<sup>①</sup> 美国政府乌克兰问题特使库尔特·沃尔克(Kurt Volker)明确指出,在乌克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美俄关系将“跛足前行”。<sup>②</sup> 而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将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是否“彻底悔改”视为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先决条件。有研究认为,在乌克兰问题未彻底解决之前,美俄恐将长期陷入“乌克兰陷阱”,美国对俄政策难有突破。<sup>③</sup>

## (二) 现有解释的不足

上述解释的最大不足在于,无法解释在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已经高度认同中国是美国首要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大国竞争因素为何无法在美国对俄政策决策中发挥主导性影响。需要承认的是,冷战后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威胁认知不是固定不变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基本采取了对华接触政策,2001年“9·11”事件后中美又一度在反恐等问题上实现合作。在奥巴马政府以前,中美战略竞争因素不是影响美国对俄政策的主要因素,这段时期美对俄政策未能实现根本转变的原因或可归结为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继而其继任者特朗普实施“印太战略”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威胁认知不断强化,应对“中国挑战”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优先性不断提升。按照大国政治的基本逻辑,此时美国的对俄政策应当越来越受到中美战略竞争考量的影响而表现出更显著的缓和姿态。但事实刚好相反,冷战后美国对俄政策“高开低走”的周期规律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退化为“低开低走”,而其后的拜登政府则甚至直接选择了与俄罗斯打代理人战争。为什么中美战略竞争趋势越明显,美国对中国是其首要竞争对手的认知越明确,美国对俄政策反而越强硬?

此外,国内政治博弈、地缘战略矛盾、意识形态对立等因素均不必然阻

---

<sup>①</sup> 冯玉军、尚月:《美俄关系新发展与中国的政策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19—33页。

<sup>②</sup> “Ukraine Crisis Will ‘Cripple’ Russia-US Relations, Envoy Warns,”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8, 2017, <https://www.unian.info/politics/2101791-ft-ukraine-crisis-will-cripple-russia-us-relations-envoy-warns.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月5日。

<sup>③</sup> 李秀蛟:《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第141页。

碍美国因大国战略竞争考量而调整与曾经战场敌人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是当时美国两党一致认定的美国首要竞争对手。在苏联强势追赶以及越南战争对美国资源的消耗下,尽管综合国力上仍是明显的美强苏弱,当时美国国内也存在巨大的反华倾向,并且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还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但当时的美国政府选择并执行了缓和与中国关系进而联中制苏的政策,这种政策在之后的较长时间内得到延续。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前,美中两国在朝鲜、中国台湾、越南、核武器等一系列重大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曾存在尖锐矛盾和历史纠葛,更不用说冷战背景下两国意识形态层面的截然对立。当时美中两国在这些高政治议题上的分歧程度至少不小于当前美俄两国在乌克兰、叙利亚、伊核等问题上的分歧程度。在当时和现在,美国都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同样都认为自己受到另一个实力尚明显弱于自己的大国的挑战,并且都将这个国家认定为自己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地缘矛盾等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没能阻止当时的美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如今却一直在阻止美国调整对俄政策?上述这些困惑表明,学界和战略界对美国对俄政策的现有理解仍存在盲点,美国难以从根本上调整对俄政策存在尚未探明的深层制约机制。

## 二、同盟牵连下的大国战略收缩障碍

### (一) 大国战略收缩的两种途径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大国战略收缩有三种方式,分别是放弃一个国家所承担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某些义务,与威胁性较小的大国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以及对新兴大国退让或采取绥靖政策。<sup>①</sup> 保罗·麦克唐纳(Paul MacDonald)和约瑟夫·派伦特(Joseph Parent)认为,大国可以通过重新部署海外部队、化解冲突爆发点和重新分配责任负担等方

---

<sup>①</sup> 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191页。

式进行战略收缩。<sup>①</sup>周方银认为,战略收缩的主要表现是减少对外战略资源投入、减小对外政策介入的地域范围、降低对外政策介入力度、降低同盟义务和对盟国的承诺、减少或撤回在海外的军事部署等。<sup>②</sup>综合这些论述看,大国进行战略收缩存在两种基本途径:其一是“开源”,即将自身原本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分摊给其他国家,增加国际义务的承担方和相关资源的供给方。其二是“节流”,即与非主要对手缓和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

就第一种“开源”途径而言,显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和意愿成为一个大国国际负担的分担国,大国负担分摊的主要对象是与其有同盟关系的国家。有研究指出,盟友的可用性(availability)是影响战略收缩的重要因素。<sup>③</sup>拥有众多盟友的大国一方面可以将原本由其承担的军事义务转交由盟友共担,另一方面在重要战略问题上还可以要求盟友给予明确的政治外交支持。

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做的。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sup>④</sup>,自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就一直在实施战略收缩。一方面,美国明确要求盟国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例如,2015年美国与日本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解除对日本自卫队行动的地理限制,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并提出实现从平时到发生突发事件的“无缝”合作。<sup>⑤</sup>又如,美国全面取消对韩国发展导弹射程和载荷的限制,允许韩国开发中远程导弹,以

①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

② 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第3页。

③ MacDonald and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p. 3.

④ 学界普遍认为,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正经历一定程度的相对衰落。参见:Richard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 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2008, pp. 44-56; 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第8页。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因而建议,美国须调整自己的大战略,实施自我克制和战略收缩。例如,Barry R. Posen,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 S. Grand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⑤ 新华社:《美日防卫指针扩大合作范围》,2015年4月29日,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4/29/c\\_127745250.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4/29/c_127745250.htm),访问时间:2023年1月10日。

提升韩美双方共同应对朝鲜半岛问题和全球问题的军事能力。<sup>①</sup> 另一方面,在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议题上,美国要求盟友明确选边共同对抗中国。例如,2021年10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表示,中国崛起已经对北约安全造成影响,“所以加强我们的集体防御,也是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sup>②</sup>。

至于第二种“节流”途径,美国实施战略收缩后,除中国外,最有可能分散美国注意力、最有可能持续性消耗美国战略资源的就是俄罗斯,结束与俄罗斯的敌对关系是最有效的“节流”选项。有研究指出,奥巴马政府改善与俄关系,与俄罗斯合作是“美国在实力相对下降后的无奈选择。为了避免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美国需要与传统盟国和新兴大国协调”<sup>③</sup>。

事实上,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多次明确表达过改善美俄关系的意愿。2009年2月,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新政府上台伊始就明确表示,“是时候按下重置按钮,重新审视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与俄罗斯合作的许多领域了”<sup>④</sup>。即使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仍然表示:“如果俄罗斯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条尊重周边国家主权和民主发展的和平合作道路,美国也将敞开大门,同俄罗斯在共同利益领域开展更多合作。”<sup>⑤</sup>

---

① 韩联社:《韩美修改导弹指南松绑固体火箭限制》,2020年7月28日, <https://m-cn.yna.co.kr/view/ACK20200728005500881?section=search>,访问时间:2023年1月10日。

② Roula Khalaf and Henry Foy, “Nato to Expand Focus to Counter Rising China,”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8,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0202ed6e-62d1-44b6-a61c-8b1278fcf31b>,访问时间:2023年1月10日。

③ 傅勇:《俄美关系“重启”的战略分析与借鉴》,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9期,第47页。

④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Biden at 45th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February 7, 200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remarks-vice-president-biden-45th-munich-conference-security-policy>,访问时间:2023年1月10日。

⑤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5,” February 2015, p. 25, <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15.pdf?ver=TJJ2QfM0McCqL-pNtKHtVQ%3d%3d>,访问时间:2023年1月10日。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同样表现出了改善美俄关系的积极意愿。<sup>①</sup>2017年2月16日,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首次公开讲话中明确表示,美国将“考虑在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利于美国人民的务实合作领域与俄罗斯合作”<sup>②</sup>。在2018年9月的总统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G8比G7会更好。让俄罗斯回归将是一件积极的事情”<sup>③</sup>。2019年2月,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有着广泛的伙伴关系。”<sup>④</sup>在2020年9月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称,“我认为我们与中国之间的问题比与俄罗斯之间的问题更大”<sup>⑤</sup>。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久即同意延长与俄罗斯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与俄罗斯在相关议题领域合作的意愿。

## (二) 战略收缩下的同盟牵连

尽管理论上大国可以同时采用“开源”和“节流”这两种战略收缩途径,但是由于同盟的牵连作用,面向盟国的“开源”和面向次要对手的“节流”往往难以兼容,这是导致美国至今无法将改善美俄关系意愿转变为实际政策的根本原因。

“牵连”(entrapment)一词最早由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提出。他认为,联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可能担心“自己会陷

①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ussia: Background and U. S. Policy,” August 2017, p. 4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4775>,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0日。

② Rex W. Tillerson, “Remarks Following Meeting with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6, 2017,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02/267671.htm>,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0日。

③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in Charlevoix, Canada,” January 9, 2018,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the-presidents-news-conference-charlevoix-canada>,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0日。

④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in Hanoi, Vietnam,” February 28, 2019,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the-presidents-news-conference-hanoi-vietnam>,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0日。

⑤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September 18, 2020,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the-presidents-news-conference-1263>,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0日。

入一场自己不愿参加的战争”。<sup>①</sup> 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进一步指出,同盟成员始终面临牵连和抛弃(abandonment)两种风险,对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双重恐惧构成了联盟安全困境(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sup>②</sup> 他将“牵连”定义为“被盟友拖入到一场与自身无利害关系或者关系很小的利益冲突中”<sup>③</sup>。之所以会出现牵连问题,是因为同盟成员往往承担援助盟友的同盟义务,当盟友面临军事威胁或入侵时,如果同盟成员不提供援助,则将承担相应的声誉成本和观众成本。<sup>④</sup> 而影响牵连风险大小的最主要因素是同盟国家对联盟的相对依赖程度。相对于对同盟依赖度更高的盟国,对同盟依赖度更小的盟国更可能会面临牵连风险。<sup>⑤</sup>

在一般情况下,不对称同盟中的大国更担心被牵连,小国更担心被抛弃。<sup>⑥</sup> 但如果大国相对实力下降,大国反而可能成为更担心被抛弃的一方,

---

① Michael Mandelbaum,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51.

② 一国因担心被盟友抛弃选择强化同盟关系,但这种努力又会使得自身更容易因盟友的行为而被牵连;而如果为防止被盟友牵连,一国选择疏远或弱化同盟关系,这种做法又会加大自己被盟友抛弃的风险。抛弃和牵连两种风险之间的这种反比关系,构成了同盟内部的安全两难。参见 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 467.

④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 No. 1, 1997, pp. 68-90; Douglas M. Gibling, “The Costs of Reneging: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3, 2008, pp. 426-454; Mark J. C. Crescenzi et al., “Reliability,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2, 2012, pp. 259-274; Gregory D. Miller, *The Shadow of the Past: Reputation and Military Alliances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⑤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p. 471-472.

⑥ Michael Mandelbaum,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pp. 151-152;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pp. 183-184;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6—38页。

而小国反而更担心被牵连。<sup>①</sup>这是因为,当大国因实力下降而选择战略收缩时,出于“开源”的需要,大国对同盟的依赖必然增加,尤其是在大国需要盟友的政治支持和选边站队来与其他大国开展战略竞争的情况下。而大国间的战略竞争所带来的选边压力乃至冲突风险对多数小国盟友来说并不符合其利益。对盟友依赖程度的增加和与盟友之间较低的利益共享程度,使得大国被盟友抛弃的风险上升。<sup>②</sup>针对美韩同盟的一项实证研究显示,相较于布什—卢武铉、奥巴马—李明博时期,特朗普—文在寅时期的美韩同盟呈现出“大国更需要小国而小国疏远大国”的态势。而随着中国持续崛起,美国对地区盟友的依赖程度也将越来越大。<sup>③</sup>在这种趋势下,美国的盟国更可能被牵连到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而美国则反而更担心被盟友抛弃。

小国与大国结盟的主要动机是获得后者的安全保障,因此对大国来说,降低被小国盟友抛弃的风险的最主要方式是向后者做出更为可信的承诺,让小国相信其安全保障的可靠性。根据詹姆斯·费伦(James D. Fearon)的研究,存在两种提高本国安全承诺可信度的方式。一种是“自缚手脚”(tying hands),即通过正式和公开的方式将自己的安全承诺公之于众,增加自己不按承诺做事的观众成本和声誉成本,降低自己不履行承诺的净收益,从而降低其他盟国对本国违背联盟承诺的担忧。另一种是“沉没成本”(sinking costs),其核心是通过事先加大对合作对象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投入,让盟友相信其在冲突中提供援助的可信度。<sup>④</sup>无论是哪种方式,降低被盟友抛弃风险的关键都是增加对盟友的承诺,更好地回应和满足盟友的需求。

因此,对于实力相对下降且正在进行战略竞争的大国来说,避免被小国盟国抛弃的关键是做出更多的同盟承诺,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协约内容、明确盟约适用范围、事先加大对合作对象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等方式。通

---

① 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第5—6页。

②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p. 471-475.

③ 赵懿黑、郑华:《权力变迁视角下美韩同盟关系解读》,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2期,第45—57页。

④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pp. 68-90.

过这些手段,大国可以让盟友相信其在必要时积极介入和提供援助的决心。<sup>①</sup> 例如,为稳固美日、美韩同盟,美国就多次公开宣称对日、韩的安全承诺。2020年11月,已当选但尚未就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就向日本明确表示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确认美日两国政府通过盟约应对中国的军事合作关系。<sup>②</sup> 对韩国,则早在2016年即首度宣布向韩提供对朝“延伸威慑”,此后又在多个场合重申该承诺的有效性。<sup>③</sup>

除了口头和书面承诺外,盟国更为关注的还是大国在实际冲突中的行为。在盟国卷入冲突时,大国选择积极介入,塑造积极履行安全承诺的声誉,是增加盟友信任、降低被盟友抛弃风险的更重要方式。<sup>④</sup> 此外,对于拥有分处于不同地区的多个盟友的大国而言,当盟友遭到威胁时,即使该盟友所在地区不是大国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开展战略竞争的核心区域,大国也同样需要为该盟友提供足够充分的战略支持,以此向其他地区盟友释放出其履行同盟义务的意愿信号。<sup>⑤</sup> 对大国而言,一旦降低对某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水平,其他地区盟友对自己的信任就可能出现下滑。

①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pp. 68-90.

② 日本共同社:《拜登表示钓鱼岛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2020年11月12日,来源:<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0/11/5e2ff62f7f6c.html>,访问时间:2023年1月10日。

③ 韩联社:《韩美首脑商定维持包括部署萨德在内的对朝威慑力》,2016年9月6日,来源:<https://m-cn.yna.co.kr/view/ACK20160906005700881?section=search>,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韩联社:《韩防长:韩美商定加强对朝延伸威慑合作》,2017年10月28日,来源:<https://m-cn.yna.co.kr/view/ACK20171028000100881?section=search>,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韩联社:《韩防长会见美战略司令 美重申延伸威慑承诺》,2021年7月14日,来源:<https://m-cn.yna.co.kr/view/ACK20210714003000881?section=search>,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④ 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 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No. 4, 2003, p. 808.

⑤ 有关国家在战略互动中通过信号传递来塑造自身形象的研究,可参见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有关声誉信号的专门研究,参见 Mark J. C. Crescenzi et al., “Reliability,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2, 2012, pp. 259-274; Shiping Tang, “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2005, pp. 37-38.

但问题是,大国为避免被盟国抛弃而采取的广泛强化同盟承诺的举措,又会反过来增加被盟友牵连的风险,陷入斯奈德所揭示的同盟管理困境<sup>①</sup>,由此导致大国战略收缩受阻。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关于大国特别是霸权国是否存在被盟友牵连的风险,学界有两种常见质疑。一种质疑认为,如果盟国间的实力差距大到弱国成员即使退出同盟也不会对强国成员的安全和总体实力构成实质性削弱,那么弱国成员就不会对强国成员产生牵连作用。<sup>②</sup> 根据这种逻辑,像冷战后美国这样的单极霸权国不存在被牵连风险。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在于,只认识到联盟的实力聚集(capability aggregation)功能。<sup>③</sup> 事实上,不对称同盟的主要功能是内部控制和利益交换。大国与小国结盟的主要动机不是确保自身安全,而是获取权力,即以结盟的方式对小国施加更有力的控制,通过提供安全保障以换取小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支持和追随。<sup>④</sup> 美国历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联盟体系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价值

---

①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 467.

② 例如,肯尼斯·华尔兹根据这种逻辑认为,两极体系下的大国比多极体系下的大国更不容易被牵连。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167-170.

③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for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 906-907.

④ Christopher Gelpi, "Alliances as Instruments of Intra-Allied Control," in Helga Haftendorn et al.,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7-139; 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 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2010, pp. 158-196; James D. Morrow, "Arms versus Allies: Tradeoffs in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2, 1993, pp. 207-233; Tongfi Kim, *The Supply Side of Security: A Market Theory of Military Allia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行为原理与互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章。

的。<sup>①</sup> 维护自身领导地位,防止盟友被崛起国吸引而脱离自己领导的同盟体系,是霸权国被盟友牵连而介入盟友与第三方冲突的主要动机。

另一种质疑是,美国作为霸权国,享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战略自主性,很多情况下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是否介入盟友与第三方的冲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战略自主性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虽然,霸权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高的战略自主性和行为自由度,但不介入盟友冲突仍然会付出成本,特别是损害其在当事盟友和其他盟友心目中的战略信誉<sup>②</sup>,进而可能引发未来被更多盟国抛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sup>③</sup>。简而言之,坚持战略自主性、不为盟友所牵连固然是霸权国的自由,但霸权国必须评估和面对这么做对自身战略信誉和国际领导力等造成的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讲,霸权国同样可能面临被盟国牵连的压力和风险。

### (三) 同盟牵连下的战略收缩障碍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拥有同盟体系、负有同盟承诺的大国进行战略收缩时将面临两重障碍。第一重障碍是,为实现战略收缩,大国需要“开源”,让更多的盟友分担其国际负担,而这么做会增加自己被小国盟国抛弃的风险。为降低这种风险,大国又需要加强对盟国的承诺,而这样做的直接副作用就是强化大国与盟国的捆绑,使大国难以真正从海外彻底抽身,难以完全撤回全部战略资源。

与第一重障碍密切联系的第二重障碍是,大国为了向盟国展示自己履行同盟承诺的意愿,增加盟国对自己的信任度,必须在政策和行动层面回应盟国的利益关切特别是安全利益关切。尤其是在盟国与其他非盟国发生冲

---

<sup>①</sup> 具体参见: <https://history.defense.gov/Historical-Source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sup>②</sup>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24-125; Michael Beckley, “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 S. Defense Pac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4, 2015, pp. 14-17.

<sup>③</sup>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eds., *Domino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突或受其威胁时,大国更是需要积极介入并明确表明支持盟国的立场。这无疑会进一步分散旨在实施战略收缩的大国的精力和资源。而如果盟国的对手又是在经济、政治或军事层面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第三方国家,战略收缩大国受其牵制的程度就会更大。<sup>①</sup>

此时的战略收缩将使大国面临两难处境:如果想贯彻战略收缩的意图,那么就on应该选择改善与这些战略第三方大国的关系,或者至少不积极介入这些国家与自己盟国的冲突,以实现“节流”的目的,但这样做的后果将是失去盟国的信任和国际信誉,进而失去对自己同盟体系的领导力;而如果积极介入并选择与盟国立场保持一致,坚定支持和保护自己的盟国,又会进一步加大自己的战略资源消耗,使自己在与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竞争中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图1展示了同盟牵连阻碍大国战略收缩的作用机制。这个作用机制是制约美国调整对俄政策的根本原因。对美国而言,要想维护和加强与盟友的关系,就必须回应它们的安全关切,坚定提供安全保障并承诺共同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这样做将分散和消耗美国的战略资源,阻碍其战略收缩的实施;而如果为避免被盟友牵连而选择缓和甚至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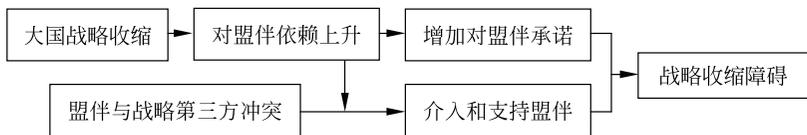


图1 同盟牵连下的大国战略收缩悖论

<sup>①</sup> 战略第三方既可以是有助于霸权国维持其霸权秩序的“关键”国家(lynchpin state),也可以是对地区安全形势有关键性影响的“枢纽”国家(pivotal state)。它既可能扮演准盟国角色,又可能成为大国战略动员和成本分担的对象。参见 Michael Mastanduno, “Partner Politics: Russia,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Extending US Hegemony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8, No. 3, 2019, pp. 484-486; Robert Chase et al., *The Pivotal States: A New Framework for U. S.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曹玮:《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 VAR 模型分析》,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5期,第39—74页;刘博文:《战略收缩时期大国竞争的印象管理》,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1期,第53页。

而集中资源应对首要对手中国,那么美国的同盟凝聚力、战略信誉和国际领导力又会受损。在维持国际领导地位这个更重要的目标压力下,美国不得不保持与俄罗斯的对抗关系。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美国的欧洲盟友对俄罗斯的安全恐惧是阻碍美国从欧洲战略收缩的核心原因。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感当然也受到美国的影响:冷战后出于捆绑欧洲的战略需要,美国一直在炮制和渲染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论”。<sup>①</sup>但不可否认的是,除美国的话语塑造外,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本身的历史纠葛与现实矛盾同样是造成欧洲国家“恐俄”的重要甚至主要原因。2009年5月,正是在与俄罗斯有很深历史恩怨的波兰等国的推动下,欧盟与乌克兰等6个前苏联加盟国正式缔结“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建立自贸区、加强能源安全的同时,密切安全与防御问题磋商。<sup>②</sup>2014年和2022年先后爆发的两次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安全担忧,成了阻碍美国从欧洲战略收缩的外生因素。

当然,不同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中东欧国家尤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视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威胁,而西欧国家则更多地将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认为俄罗斯既是重要合作对象,也是需要防范的安全威胁。但即使是最重视与俄罗斯关系的德国,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中依然秉持经济利益让位于政治安全利益的原则,极力促成欧洲理事会于2014年3月6日通过取消欧盟—俄罗斯峰会以及当年6月在索契举行G8峰会等分三阶段对俄实施严厉制裁的重大决定,并说服法国取消了与俄在圣纳泽尔造船厂建造直升机航母的10亿欧元合同,同时说服意大利总理伦齐同意新的一揽子对俄制裁方案。<sup>③</sup>危机过后,德国在2016年的《安全白皮书》中不再把俄视为“战略性合作伙伴”,而是视为“挑战”,因为“俄罗斯对欧

---

① 高程:《乌克兰危机阴影下的大国关系》,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2期,第92—97页。

② 中新网:《欧盟与前苏联六个加盟国缔结“东部伙伴关系”》,2009年5月8日,来源:<https://www.chinanews.com.cn/gj/oz/news/009/05-08/1682774.shtml>,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③ 焦一强、朱艳:《“选择性互动”与乌克兰危机以来德俄关系回暖评析》,载《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5期,第111—139页。

洲和平秩序形成了挑战”。<sup>①</sup> 总之,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认知是真实存在的。

### 三、案例研究:乌克兰问题与美国对俄政策

美俄关系研究的一个共识是,乌克兰问题是导致美国最终放弃使俄罗斯逐步融入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目标的核心变量。<sup>②</sup> 本部分将以2014年以来两次乌克兰危机为案例,展示美国在面临大国战略竞争压力并有意愿改善美俄关系的情况下,因受盟友牵连而不得不逐渐加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介入力度,并由此导致美俄关系不断恶化、美国战略资源不断分散消耗的实际过程。<sup>③</sup>

#### (一)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

与战略收缩需要“节流”的理论预期相一致的是,自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官方反复表达了改善美俄关系的主观意愿。出于对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担忧,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选择重置与俄罗斯的关系,明确通过暂缓北约东扩、调整反导计划等措施缓与与俄关系。即便美国因2011年俄罗斯杜马选举、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2013年“棱镜门”事件等公开表达过对俄罗斯的不满,但仍未放弃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美俄部长级对话等仍按

---

<sup>①</sup>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ite Paper 201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July 13, 2016, <https://issat.dcaf.ch/download/111704/2027268/2016%20White%20Paper.pdf>,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sup>②</sup> 托马斯·格雷厄姆:《新时代的俄美关系》,胡冰译,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5期,第44页。

<sup>③</sup> 需要说明的是,已有研究虽然提到乌克兰危机对于美对俄政策的影响,但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仅将乌克兰问题作为某一时期的重要危机事件,从特殊性而非一般性的角度来解释它对于美对俄政策的影响,并未进一步探究事件背后的美对俄政策的逻辑机制。极少数研究成果提及美对俄政策背后的同盟考量,但未进行深入系统的实证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周琪:《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及新挑战》,载郑秉文、黄平主编:《美国蓝皮书:美国研究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韩克敌:《特朗普的对俄政策与美俄关系的四个维度》,第663页。

期举行。2012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强调：“与俄罗斯的接触仍然重要，美国将继续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与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鼓励俄罗斯在更广泛的问题上作出贡献。”<sup>①</sup>在2013年国情咨文涉及俄罗斯的部分中，奥巴马表示：“我们将与俄罗斯保持紧密接触。”<sup>②</sup>

尽管如此，美国同样有回应甚至迎合盟友需求以避免被盟友抛弃的压力。当分歧仅局限于美俄之间时，美国仍能够保持对俄战略的绝对自主性，延续对俄重启政策。但当分歧与盟友的切实利益相关联时，美国则需要考虑盟友的安全关切并由此偏离原有的政策轨道。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极大地增加了美国欧洲盟友对乌克兰及自身的安全忧虑。在2014年3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议会上院提议在乌克兰领土动用军事力量的当天，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即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上动用军事力量，让作为乌克兰邻国的波兰感受到威胁。”<sup>③</sup>即使是对俄立场相对温和的德法两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也态度强硬。2014年5月1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发表联合声明，对乌克兰局势表示关切。<sup>④</sup>5月13日，默克尔在欧盟发表讲话宣称：“如果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不仅是乌克兰的灾难，也是对德国的威胁。”<sup>⑤</sup>

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推进，美国的欧洲盟友所感受到的俄罗斯威胁不断增加，要求美国把注意力转向欧洲的声音也越来越明显。波兰等美国的东

---

①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 3, [https://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20/04/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https://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20/04/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②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Obama’s 2013 State of the Union,” February 13, 201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3/02/13/president-obamas-2013-state-union>,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③ 人民网:《波兰称俄在乌举动使其也感受到威胁》,2014年3月2日,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302/c1002-24505560.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④ 新华网:《德法呼吁乌克兰国内各方进行对话》,2014年5月10日,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0/c\\_126484862.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0/c_126484862.htm),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⑤ “Merkel and Poland’s Tusk Vow Help for Ukraine, Warn Russia,” DW News, March 12, 2014, <https://www.dw.com/en/merkel-and-polands-tusk-vow-help-for-ukraine-warn-russia/a-17492746>,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欧盟甚至呼吁为确保盟国遭到攻击时获得帮助,应自动启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sup>①</sup>对美国而言,如何处理乌克兰问题将不仅影响其在北约的战略信誉,更会影响到其在所有盟国中的声誉。对此,美国选择了积极回应盟友的安全需要,并将其反映在了次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表示要“通过训练和军演增强反应能力,以及在中欧和东欧的活跃存在,以阻止俄罗斯进一步的侵略,让我们的盟友放心”<sup>②</sup>。

在3月6日克里米亚议会宣布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当天,奥巴马在与欧洲盟国领导人进行密切协调后,“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对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或窃取乌克兰人民资产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sup>③</sup>。3月20日,奥巴马表示,“美国对我们的北约盟国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因盟约第5条对彼此捍卫的深刻承诺以及许多世代为之牺牲的一套共同价值观而紧密相连”。不过,奥巴马同时也表示,“这不是美国想要的结果。俄罗斯仍然有一条不同的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缓和局势,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sup>④</sup>

随后,美国配合欧洲盟友,对俄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制裁。包括:3月27日,美国宣布禁止向俄罗斯发放国防产品或服务的出口许可证。7月16日,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及部分能源公司实施制裁。7月29日,对俄罗斯经济部门实施制裁。8月6日,限制向俄罗斯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相关技术。9月12日,禁止美国公司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等一批能源公司提供商品和服务。12月20日,禁止与克里米亚地区的进

---

① 《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成员国中的一国(或者多国)遭受到武装袭击将会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武装袭击,所有成员国将立即援助被袭击国家。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5,” Washington, D. C., February 2015, p. 25, <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15.pdf?ver=TJJ2QfM0McCqL-pNtKHtVQ%3d%3d>,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③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on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March 6, 201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situation-ukraine-2>,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④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on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March 20, 2014,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situation-ukraine-0>,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出口贸易。<sup>①</sup> 不仅如此,2015年3月4日,美国政府还宣布对俄罗斯制裁延长一年。此后每年美国政府都对前一年的对俄制裁进行延长,直至2022年。<sup>②</sup>

除经济制裁外,美国还与北约盟国接连开展多轮联合军演。2015年7月,美国和乌克兰等国部队在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边境地区举行代号为“快速三叉戟”的年度军演。<sup>③</sup> 2016年6月,“蟒蛇2016”联合军演、以陆军为主的“铁狼2016”多国军演和海上“波罗的海行动”在波罗的海举行。其中,“蟒蛇2016”联演规模最大,有来自19个北约国家和5个北约伙伴国的3万多名军人参加。<sup>④</sup> 2018年10月至11月,由北约29个成员国及瑞典、芬兰两个伙伴国共同参加的代号为“三叉戟接点-18”的军演举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三叉戟接点”演习假想一个北约成员国遭到入侵,其他成员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快速投入“集体防御”。<sup>⑤</sup> 2020年6月,北约“欧洲捍卫者-2020”军事演习在波兰启动,旨在通过向欧洲迅速部署美国部队来加强战略战备与协作,检验东道国接受盟军支持的能力。<sup>⑥</sup>

与此同时,美国也增加了在欧洲的军事资源投入和人员部署。2015年6

---

① Ivan Gutterman and Wojtek Grojec, “A Timeline of All Russia-Related Sanctions,” September 19, 2018, <https://www.rferl.org/a/russia-sanctions-timeline/29477179.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② Ivan Gutterman and Wojtek Grojec, “A Timeline of All Russia-Related Sanctions,” September 19, 2018, <https://www.rferl.org/a/russia-sanctions-timeline/29477179.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③ “Exercise Rapid Trident 2015 begins in Ukraine, U. S. Army Europe Public Affairs,” July 21, 2015, [https://www.army.mil/article/152586/exercise\\_rapid\\_trident\\_2015\\_begins\\_in\\_ukraine](https://www.army.mil/article/152586/exercise_rapid_trident_2015_begins_in_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④ Carlo Angerer, “Huge NATO Drills in Poland Prepare West for Possible Conflict With Russia,” June 18, 2016,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huge-nato-drills-poland-prepare-west-possible-conflict-russia-n593456>,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⑤ 新华社:《北约启动“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演习》,2018年10月26日,来源:[http://m.xinhuanet.com/world/2018-10/26/c\\_129979385.htm](http://m.xinhuanet.com/world/2018-10/26/c_129979385.htm),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⑥ “Russia not Target in US army’s Massive Europe Deployment: NATO,” February 3, 2020,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defence-and-security/news/russia-not-target-in-us-armys-massive-europe-deployment-nato/>,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宣布在保加利亚等6个前苏联加盟国部署250辆坦克、装甲车和其他军事装备,以保护北约成员国免遭来自俄罗斯及恐怖分子的威胁。<sup>①</sup>2016年2月,卡特宣布美国提供34亿美元的“欧洲再保证计划”,“该倡议旨在表明美国对其在欧洲的北约盟国的承诺。这些资金将允许将更多的部队部署到欧洲基地,以及与盟国进行更多的训练和演习,……以采取强有力和平衡的方式来阻止俄罗斯的侵略”<sup>②</sup>。美国还宣布在北约的东翼增加两个旅的重型装备。<sup>③</sup>2016年5月,美国在罗马尼亚的反导系统正式启用,并与北约的反导系统对接,同时在波兰开工建设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sup>④</sup>2017年11月,美国批准向波兰出售爱国者反导系统。<sup>⑤</sup>

人员部署方面,2016年2月,美国表示将在东欧部署一个额外的装甲旅,并提供“美国装甲旅的持续轮换”,以“能够更快、更有力地做出反应,支持北约的共同防御”。<sup>⑥</sup>在同年7月的华沙峰会上,为加强领土防御能力,北约宣布向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俄乌冲突前线国家轮流部署4000余名士

---

① “US Announces New Tank and Artillery Deployment in Europe,” BBC News, June 23, 2015,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3238004>,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② “US ‘to Quadruple Defence Budget for Europe’,” BBC News, February 2, 2016,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5476180>,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③ “US to Increase Military Presence in Eastern Europe,” BBC News, March 30, 2016,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5930130>,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④ Soraya Sarhaddi Nelson, “U. S. Enlarges Its Military Footprint in Eastern Europe, To Mixed Reviews,” NPR News, May 18, 2016, <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6/05/18/478414178/u-s-enlarges-its-military-footprint-in-eastern-europe-to-mixed-reviews>,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⑤ “US and Poland Strike \$10.5 Billion Missile Defense Deal,” DW News, November 18, 2017, <https://www.dw.com/en/us-and-poland-strike-105-billion-missile-defense-deal/a-41433719>,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⑥ Andrew Tilghman, “More U. S. Troops Deploying to Europe in 2017,” *Military Times*, February 3, 2016,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2016/02/02/more-u-s-troops-deploying-to-europe-in-2017/>,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兵。<sup>①</sup> 美国国防部表示,此举是为向俄罗斯发出明确信息,同时加强与北约盟国的关系。<sup>②</sup> 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欧洲进行的最大军事部署。2019年12月9日,美国宣布向欧洲快速部署约2万名陆军人员,此次部署又超越了2016年,创冷战以来美国在欧洲部署军事人员数量新的纪录。<sup>③</sup> 2020年7月1日,特朗普又批准向波兰增派1000名士兵。<sup>④</sup>

由上可见,克里米亚危机致使美国欧洲盟友与俄罗斯关系紧张,美国为回应盟友关切所采取的制裁、军演、军备和人员部署等一系列举措,客观上恶化了美俄关系,并使美国不得不在欧洲保持甚至增加资源投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危机中始终明确排除军事选项,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愿主动恶化与俄关系的意愿。<sup>⑤</sup> 2014年3月,乌克兰临时政府呼吁美国提供包括武器、弹药和情报支持在内的军事援助,但奥巴马政府只同意暂时援助军用口粮。<sup>⑥</sup> 2014年9月,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时呼吁美国提供更多军事援助,但美国政府拒绝将武器纳入

---

① Paul Belkin, "NATO's Warsaw Summit: In Brief,"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November 14, 2016, p. 1, <https://sgp.fas.org/crs/row/R44550.pdf>,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② Laura Smith-Spark and Atika Shubert, "Poland Welcomes Thousands of US Troops in NATO Show of Force," CNN, January 14,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01/14/europe/poland-us-troops-nato-welcome/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③ Ed Adamczyk, "U. S. Military Announces Largest Deployment to Europe in 25 Years for 2020 Exercises," UPI News, December 9, 2019, <https://www.upi.com/Defense-News/2019/10/09/US-military-announces-largest-deployment-to-Europe-in-25-years-for-2020-exercises/7921570646687/>,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④ Howard Altman and Joe Gould, "Trump Approves Pentagon Plan to Pull 9,500 US troops from Germany," July 1, 2020,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news/your-military/2020/06/30/trump-approves-pentagon-plan-to-pull-9500-us-troops-from-germany/>,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⑤ 张健:《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北约转型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5期,第12、15页。

⑥ Adam Entous, "Obama Administration Turns down Request from Ukraine for Weapons and Ammuni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4, 2014,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atosource/obama-administration-turns-down-request-from-ukraine-for-weapons-and-ammunition/>,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中。<sup>①</sup> 不仅如此,美国还明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非北约盟友地位。<sup>②</sup> 这一举动也体现出美国虽因北约盟友不得被牵连到乌克兰问题中,但仍尽可能避免因将乌克兰纳入正式同盟阵营而加大牵连风险。2015年2月,奥巴马表示,希望四方和谈顺利,在此之前美国不会武装乌克兰。<sup>③</sup> 2015年6月,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进攻性武器援助,以避免原本可通过外交谈判缓解的局势升级;此外,尽管美俄对后者在乌克兰的破坏稳定活动存在重大分歧,但双方能够在一系列对两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进行合作,“俄罗斯一直是重要的建设性贡献者”<sup>④</sup>。美国在对俄政策上的这些保留进一步表明,其在乌克兰危机后的对俄敌对政策主要是受到盟友的牵连。

## (二) 2022年俄乌冲突

2022年2月21日,普京宣布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22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俄罗斯两国有金融机构、5名俄罗斯精英及其家人实施制裁并扩大主权债务禁令。但拜登同时表示,这些举措“完全是防御性的,我们无意和俄罗斯作战。但想传达一个准确的信息——美国将和我们的盟友一起保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遵守我

---

① Oren Dorell, “White House Rebuffs Ukraine Appeal for Weapons,” *USA TODAY*, September 18, 2014,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4/09/18/ukraine-poroshenko-speaks-to-congress/15819211/>,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② “President of Ukraine Tells CNN’s Wolf Blitzer that U. S. Has Refused Ukraine’s Request for Weapons,” *CNN*, September 18, 2014, <https://cnnpressroom.blogs.cnn.com/2014/09/18/president-of-ukraine-tells-cnns-wolf-blitzer-that-u-s-has-refused-ukraines-request-for-weapons/>,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③ “Won’t Arm Ukraine until Peace Process Finishes, Obama Says after Meeting with Angela Merkel,” *National Post*, February 10, 2015, <https://nationalpost.com/news/world/wont-arm-ukraine-until-peace-process-finishes-obama-says-after-meeting-with-merkel>,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④ The White House,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Josh Earnest on G-7 Summit,” June 7, 2015,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06/07/briefing-press-secretary-josh-earnest-g-7-summit>,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们对北约的承诺”<sup>①</sup>。23日,拜登宣布针对俄罗斯“北溪-2”项目运营公司及其公司高管进行制裁<sup>②</sup>,但同时白宫新闻发言人表示拜登无意派兵到乌克兰参战,“我们不太聚焦乌克兰政治,而是聚焦防止战争”<sup>③</sup>。可见,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的再次恶化,美国因为对北约盟友的承诺而被进一步卷入俄乌冲突,但仍然将介入限定在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范围之内。

随着乌克兰局势的恶化,美国的反制措施也随之升级。2月24日,普京宣布在乌克兰东部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拜登第一时间发表紧急声明,表示“将与北约盟友进行协调,以确保作出强有力和团结一致的反应,阻止任何对北约的侵略”<sup>④</sup>。3月2日,拜登发表就任以来首次国情咨文演讲,表示将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让俄罗斯付出经济代价。在此番制裁中,美国财政部、国务院和商务部分工合作,精准制裁打击目标群体。其中,美国财政部的制裁目标群体是俄罗斯知名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精英人士,以及豪华资产管理和服务公司;国务院的制裁目标群体是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寡头和精英;商务部的制裁目标则是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方获得维持其军事行动和投射力量所需的技术和其他物品的能力。据美国白宫消息,到2023年2月,美国通过持续多轮扩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已在财政部的制裁人员名单中增加了1000个当事方,在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中增加了300多

---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Imposes First Tranche of Swift and Severe Costs on Russia,” February 2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2/22/fact-sheet-united-states-imposes-first-tranche-of-swift-and-severe-costs-on-russia/>,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②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iden on Nord Stream 2,” Februar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2/23/statement-by-president-biden-on-nord-stream-2/>,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5日。

③ The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Februar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2/23/press-briefing-by-press-secretary-jen-psaki-february-23-2022/>,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④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iden on Russia’s Unprovoked and Unjustified Attack on Ukraine,” Februar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2/23/statement-by-president-biden-on-russias-unprovoked-and-unjustified-attack-on-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个当事方。<sup>①</sup>

除单独制裁外,美国还与七国集团、欧盟等联合对俄实施制裁,以彰显同盟的凝聚力。例如,3月11日,美国宣布与七国集团、欧盟采取同步行动,撤销俄罗斯“最惠国待遇”,剥夺俄罗斯在多边金融机构的借款权,对俄罗斯精英及其家属进行全面制裁,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奢侈品,创建禁止在俄罗斯任何部门进行投资的权力机构。<sup>②</sup>3月24日,美国表示,美国与欧盟和七国集团合作,已制裁400多名俄罗斯精英、杜马成员和国防企业。“我们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从未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如此迅速、如此协调一致地给其他国家施加过如此毁灭性的打击。”<sup>③</sup>

美国还积极与盟国举行联合军演以威慑俄罗斯。5月1日至27日,由美军领导的大规模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欧洲捍卫者-2022”和“快速反应2022”在欧洲九国举行,军演旨在建立美国与北约盟国和伙伴间的备战和协同作战能力。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也参加演习,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航母打击群第二次听从北约指挥。<sup>④</sup>2022年11月,在波兰遭到导弹袭击后,北约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举行大规模海上联合军演。美、法、意、英四国联手出动五大航母,北约发言人表示,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的背景下,“这些航母具有威慑作用,有助于保持我们海上交通线的畅通。我们发

---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Takes Further Actions to Counter Sanctions Evasion by Russia,” February 2,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02/fact-sheet-united-states-takes-further-actions-to-counter-sanctions-evasion-by-russia/>,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②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G7 to Announce Further Economic Costs on Russia,” March 1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11/fact-sheet-united-states-european-union-and-g7-to-announce-further-economic-costs-on-russia/>,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③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and Allies and Partners Impose Additional Costs on Russia,” March 2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24/fact-sheet-united-states-and-allies-and-partners-impose-additional-costs-on-russia/>,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④ Poland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Exercises Defender Europe 2022 and Swift Response 2022 Begin,” May 1, 2022, <https://www.gov.pl/web/national-defence/exercises-defender-europe-2022-and-swift-response-2022-begin>,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北约将保护和保卫盟国的每一寸领土”<sup>①</sup>。与此同时,11月26日,北约2000名军人还在波兰北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图马克-22”的军事演习,以策应乌克兰,威慑俄、白两国。<sup>②</sup>

此次俄乌冲突也迫使美国增加在前沿国家的军事部署。为强化对北约盟国的支持,拜登于2月2日正式批准向罗马尼亚、波兰和德国增派3000名美军士兵。<sup>③</sup>在2月24日当天,拜登宣布已授权增派军队驻守德国,并将地面部队和空军部署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罗马尼亚。<sup>④</sup>3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向欧洲增派500名士兵以及军备力量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这是2005年以来美军首次在欧洲部署达到10万人”<sup>⑤</sup>。

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期间的行为相比,美国在此次危机中明确向乌克兰提供了直接的军事援助。2月25日,美国白宫称,总统拜登已签署备忘录,向乌克兰提供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sup>⑥</sup>据美国国防部统计,仅自2月

---

①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Five NATO Aircraft Carriers Hold Drills in Major Naval Deployment,” November 18, 202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209232.htm?selectedLocale=en](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209232.htm?selectedLocale=en),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② “NATO Exercises in Poland Near Borders with Belarus and Russia,” Insight News, November 26, 2022, <https://insightnews.media/nato-exercises-in-poland-near-borders-with-belarus-and-russia/>,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③ Natasha Bertrand et al., “US Troops to Deploy to Eastern Europe amid Ukraine Crisis,” CNN, February 3, 2022, <https://edition.cnn.com/2022/02/02/politics/us-troops-europe-russia/index.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④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Russia’s Unprovoked and Unjustified Attack on Ukraine,”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2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russias-unprovoked-and-unjustified-attack-on-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⑤ John Vandiver, “US has 100,000 Troops in Europe for First Time since 2005, Stars and Stripes,” March 15, 2022, <https://www.stripes.com/theaters/europe/2022-03-15/us-forces-record-high-europe-war-ukraine-5350187.html>,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⑥ Steve Holland and Mike Stone, “Biden Approves \$350 Million in Military Aid for Ukraine,” Reuters, February 27,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biden-approves-350-million-military-aid-ukraine-2022-02-26/>,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24日冲突爆发至5月,美国就已累计向乌克兰提供约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sup>①</sup>5月19日,美国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的新援助,其中包含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援助,包括交付“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远程火炮武器。<sup>②</sup>此外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对乌克兰的租借法案,授权拜登政府在2022财年和2023财年向乌克兰和受冲突影响的其他东欧国家出借或出租军事装备。<sup>③</sup>而上一次类似的租借法案还要追溯到1941年二战期间。2023年2月3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再为乌克兰提供价值21.7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迄今为止,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9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sup>④</sup>

对比2014年和2022年两次危机期间的反应可以发现,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程度(亦即对俄罗斯的敌对程度)与其欧洲盟友对俄罗斯的态度密切相关。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中美国的欧洲盟友对俄态度相对温和。危机期间,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尽管态度强硬,指责俄行为不可接受,但仍保留对话空间。2014年11月默克尔总理在访问波兰时称,只有与俄罗斯一道,才能捍卫欧洲的安全。2015年2月,默克尔再次公开表示,德国政府、法国和欧洲各国政府不应放弃把俄罗斯视作伙伴的机会,希望在不改变制裁的原则下,与俄罗斯一起构建欧洲和平秩序,而不是排挤俄罗斯。<sup>⑤</sup>与之相对应,

---

①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on U. S. Security Assistance for Ukraine,” May 10,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027295/fact-sheet-on-us-security-assistance-for-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② Mike DeBonis and Dan Lamothe, “U. S. Deepens Ukraine Commitment with \$40 Billion in Aid and Expanded NATO,”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9,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05/19/ukraine-aid-senate/>, 访问时间:2023年1月18日。

③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Biden Signs Lend-Lease Act to Supply More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May 9,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025302/biden-signs-lend-lease-act-to-supply-more-security-assistance-to-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0日。

④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nounces Addi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 Ukraine,” February 3,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287992/biden-administration-announces-additional-security-assistance-for-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0日。

⑤ 焦一强、朱艳:《“选择性互动”与乌克兰危机以来德俄关系回暖评析》,第129页。

美国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中除口头谴责和宣布对俄罗斯官员、公司实施制裁外,并未对俄罗斯的军事干预和对克里米亚的兼并采取更多实质性行动。

而在 2022 年俄乌冲突中,欧洲盟国明显态度更为强硬。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俄罗斯决定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当天表示,“乌克兰人民和政府将得到我们充分的援助。我们将向俄罗斯领导层表明,他们将为这次军事行动付出高昂的代价”<sup>①</sup>。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则表示,“探索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防御性支持”<sup>②</sup>。2月27日,朔尔茨再次表示,德国有责任尽其所能支持乌克兰防御俄罗斯的入侵,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1000 件反坦克武器和 500 枚“毒刺”地对空导弹。<sup>③</sup>而德国是西方国家中最希望缓解俄乌紧张关系的国家。英国则在危机初期就向乌克兰提供了近 4000 套轻型反装甲防御武器系统。<sup>④</sup>在最新的英乌《联合声明》中,英国确认自 2022 年俄乌冲突一年多来,已向乌方提供包括武器、人道主义物资在内的超过 40 亿英镑援助。2023 年 2 月 8 日,德法乌三国领导人举行联合记者会,德法领导人“发誓”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sup>⑤</sup>与之相对应,美国在此次俄乌冲突中的介入程度也更深,不仅谴责和制裁俄罗斯,更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情报等军事援助。

---

① “Fernsehansprache von Bundeskanzler Scholz anlässlich des russischen Überfalls auf die Ukraine,”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suche/fernsehansprache-von-bundeskanzler-scholz-anlaesslich-des-russischen-ueberfalls-auf-die-ukraine-2007824>, 访问时间:2023 年 1 月 20 日。

②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M Call with President Zelenskyy of Ukraine,” February 21,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m-call-with-president-zelenskyy-of-ukraine-21-february-2022>, 访问时间:2023 年 1 月 20 日。

③ The German Government, “Das ist Putins Krieg,” February 27, 2022,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suche/bundesregierung-ukraine-krieg-russland-2007430>, 访问时间:2023 年 1 月 20 日。

④ The British Government, “Russia’s Ongoing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UK Statement to the OSCE,” March 16, 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russias-ongoing-war-of-aggression-against-ukraine-uk-osce-statement-16-march-2022>, 访问时间:2023 年 1 月 20 日。

⑤ “Zelensky Urges France, Germany to be ‘Game Changers’ by Sending Modern Planes,” *Reuters*, February 9, 2023, <https://www.reuters.com/news/picture/zelenskiy-urges-france-germany-to-be-gam-idUSKBN2UG1X3>, 访问时间:2023 年 1 月 20 日。

不过,尽管美国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的对俄政策更为强硬,但其仍表现出主动克制和避免进一步升级美俄双边冲突的意愿。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当天,拜登重申“美国将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但不会介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去欧洲的美国军队“不是为了在乌克兰作战,而是为了保卫北约盟国”。<sup>①</sup> 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在乌克兰上空对俄罗斯飞行器设立禁飞区的提议,美国白宫发言人明确表示,要落实设立禁飞区,就需要“部署美国军队来执行”,但这可能导致美俄发生直接冲突甚至战争,“我们不打算卷入这种冲突”。<sup>②</sup> 可见,美国虽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但仍谨慎避免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这表明美国为执行战略收缩政策,在主观上并不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冒过多军事风险,为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的主要考量是为回应欧洲盟友的安全关切、践行同盟承诺。但如前所述,这样做的客观后果是加剧美俄对立,进一步阻碍美国对俄政策调整。

## 四、结论

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对国际格局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sup>③</sup> 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的中美建交极大地改变了美苏冷战的总体战略态势以及当时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对世界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已取代昔日的苏联成为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在中美战

---

①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Russia’s Unprovoked and Unjustified Attack on Ukraine,”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2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russias-unprovoked-and-unjustified-attack-on-ukraine/>,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0日。

② The 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s-briefings/2022/02/28/press-briefing-by-press-secretary-jen-psaki-february-28-2022/>,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0日。

③ 王鸿刚:《亚太变局中的中美俄三角合作》,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编:《中美亚太共处之道:中国、美国与第三方》,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页;李兴:《试析当今中俄美三角关系的若干特点》,载《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1期,第11—18页;李静杰:《中俄战略协作和中美俄“三角关系”》,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4期,第42—48页。

略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俄罗斯是影响中美博弈的重要战略第三方之一<sup>①</sup>,美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是评估和预判中国崛起战略环境的重要参数。<sup>②</sup>而准确预判美俄关系走向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准确理解影响特别是制约美国对俄政策调整的原因。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所在。

在美国已经明确认定中国是其首要战略对手,且为应对“中国挑战”已决意进行战略收缩的情况下,美国的最优策略显然应当是重施1972年联华抗苏之“故技”,克服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地缘矛盾等障碍,毅然选择与俄罗斯和解、联俄制华。但美国的实际选择却与这种理论预期刚好相反,2022年的俄乌冲突因美国积极介入和支持乌克兰而进一步加剧了美俄对抗态势。本文指出,导致美国实际政策选择偏离理性最优选项的核心原因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意图与其同盟战略之间存在深刻矛盾:美国要想更有力地遏制中国就必须进行战略收缩以集中资源,而进行战略收缩就必须更多依赖盟友的力量,必须对盟友提供更可信的同盟承诺以回应盟国的安全关切,而俄罗斯正是美国欧洲盟友的主要安全威胁。美国要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必须站在盟友一边,与俄罗斯为敌;而要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则将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友的信任。这种矛盾从根本上限制

---

① 曹玮:《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VAR模型分析》,第39—74页。

② Dmitry Trenin, “The Impact of Sino-American Rivalry on Russ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18, 2021, <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5580>,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2日; Vu Le Thai Hoang and Huy Nguyen, “The Modern China-Russia-US Triangle: Why We Can’t Expect a Stable ‘Two vs One’ Dynamic This Time Around,” *The Diplomat*, June 4,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6/the-modern-china-russia-us-triangle/>,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2日; Christopher Marsh and Lowell Dittmer, “The Russian Factor in U.S.-China Relations,”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Northeast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23-142; Zbigniew Brzezinski, “How to Address Strategic Insecurity in a Turbulent Age,” *The World Post*, January 3, 2017,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us-china-russia-relations\\_b\\_586955dbe4b0de3a08f8e3e0](https://www.huffpost.com/entry/us-china-russia-relations_b_586955dbe4b0de3a08f8e3e0), 访问时间:2023年1月22日; 毕洪业:《“战略三角”还是“三边互动”:新时代的中美俄关系》,载《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第127—156页; 韩璐、刘飞涛:《大变局下中美俄大国关系互动探析》,载《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4期,第26—46页。

了美国的对俄政策选择。

本文的研究为我们反思同盟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角度。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正式盟友最多的国家,同盟体系是二战后美国霸权体系的重要支柱。<sup>①</sup>拜登上台后,不断强化美国既有同盟体系,并大力打造新的多边安全机制,积极推动“亚洲版北约”。显然,美国之所以如此看重同盟战略,一定是因为它认为同盟对其维护霸权地位和对其有利的国际秩序有积极作用。<sup>②</sup>近年来,中国学界一直有声音主张反思原有的不结盟战略,认为缺乏正式盟友是中国在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时的一个短板和不利因素。但本文的研究则表明,同盟并不总是一个大国的“正资产”。美国之所以目前无法集中全部力量和资源遏压中国,根本原因就是美国有盟友并且美国需要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sup>③</sup>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同盟体系反而成了美国的一个“负资产”,这个“负资产”有可能在客观上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

① Kurt M. Campbell, “The end of alliances? Not so Fa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2, 2004, pp. 151-163; Michael Lind, “Beyond American Hegemony,”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June 2007, No. 89, pp. 9-15; Matteo Dian and Hugo Meijer, “Networking Hegemony: Alliance Dynamic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 57, 2020, pp. 131-149; Michael Wesley, “Global Allies in a Changing World,” in Michael Wesley ed., *Global Allies: 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nberra: ANU Press, 2017, pp. 1-14; 倪峰:《霸权稳定模式与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秩序》,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7期,第10—17页;吴征宇:《霸权、同盟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4期,第88—90页。

② 与拜登政府相比,前任特朗普政府相对轻视同盟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根据同盟理论,这种情况下美国受盟友牵连的可能性也较低。但降低牵连风险的代价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与其盟友关系普遍紧张(2019年1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批评北约正走向“脑死亡”),而中国与美国盟友关系发展迅速(2020年12月中欧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该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战略收缩意图与同盟外交之间的矛盾:贯彻战略收缩意图将导致与盟友关系的疏远和自身国际领导力的削弱。

③ 近期美国与其亚太盟友的安全防务合作不断强化,同时美国的欧洲盟国也在更加频繁地介入“印太”/亚太安全事务。从表面上看,美国即使受俄乌冲突牵连无法进行充分战略收缩,也依然可以对中国持续施加压力。但问题是,无论是否受到同盟牵连,美国都有动机联合盟友打压中国。当美国未受牵连因而无需向东欧投入战略和军事资源,并且无需与另一个政治军事大国打代理人战争(甚至反而有可能联合该大国共同孤立中国)时,中国所承受的来自美国的遏制压力显然更大;而当美国因同盟牵连而不得不向东欧不断输送资源,并且不得不与俄罗斯间接作战时,中国所承受的压力无疑更小。